

中國歷代著名
文學家評傳

郭沫若題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 一 卷

（周秦汉魏晋南北朝）

吕慧鹃 刘 波 卢 达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一卷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75印张 2插页 430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801—12,300

书号 10275·8 定价 2.85元

前 言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多民族国家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文化巨人。仅就文学家而言，早在公元以前，便出现了遐迹闻名堪称世界文学巨人的屈原、司马迁等。许多世纪以来，优秀的文学家生生不息，倍增迭出。他们的作品象条条巨川，汇入浩瀚的海洋，构成中华民族多彩多姿的一部文学发展史。

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任务中，继承和发扬古代作家思想和艺术中的优良传统，以为今天的借鉴；并借此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这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教育部已将此书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并曾约请部分专家加以审订。

这是一部大型的作家评传，共六卷，约二百余万字。全书评介了自先秦至“五四”前一百六十余位作家，基本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文学家活动的概貌。它不同于作家年谱，采用了以传为主、寓评于传、评传结合的体例。即以作家生平系年和作品系年为主线，对每个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作品都有较为详细的述评。每篇末还附有主要参考书目，以便读者自学。因此，它比较适合于作为学习文学史的参考教材。广大读者从中可以看到

古老的中华民族，为世界文坛哺育了多少优秀作家。

这是一部力图肃清极左影响的书。文学评论应该以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为标准。优秀作品，应是二者高度完美的统一；粗劣作品，既无艺术性，也难以表现深刻的思想性。但是长期以来，文学评论中严重地存在着极左影响。主要是以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古代作家作品。列宁说：“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而极左思潮者却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任意苛求古人，曲解文学史上的种种复杂现象，褒贬取舍纯以实用主义为尺度。或者是以作品的政治性完全代替了思想性，并割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只要思想性，不要艺术性。对那些思想上无害、艺术上有益的作品一概排斥，甚至发展到对那些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益的作品，也大加挞伐。李煜词被全盘否定，自不在话下，连陶渊明、王维、李清照等人的作品都不能幸免，甚至《红楼梦》也一度大有岌岌可危之势。本书注意纠正这一极左影响，在重视作品思想性的同时，还比较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在重视作家政治态度的同时，还比较注意其艺术技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贡献。如有的作家基本政治倾向不好或一个时期不好，但其某些作品并未表现出反动的政治倾向来，而且艺术性比较高或影响较大，也予录选，并注意分析、肯定其艺术成就。同时也注意防止对古代作家良莠不分、精华糟粕兼收并蓄甚至一味抬高的错误倾向。

这是一部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书。撰稿人都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并注意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特殊规律去研究作家及其作品。但是，在具体运用中，所得结论却又

不尽相同，甚至很不一致。这不仅表现在对各个作家的评价标准上，即或涉及同一作家作品，见仁见智，也时有不同。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要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做出科学的结论，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要经过反复曲折的过程。只有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从中加以比较、鉴别，最终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接近科学的结论来。对于众说纷纭的学术争论，撰稿人不仅止于客观介绍，还能表明自己的观点，代表了一家之言。从他们的文章中，还可看出蹊径不同的治学方法和各具特色的写作风格，这对读者治学也大有裨益。

这是一部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书。从质的方面看，它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大多数撰稿人对所写作家都研究有素，甚至竭尽平生精力。无论对作家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也无论辨误文字、辨析字义或校勘版本、笺释作品，都做过大量工作；因而能做到评述观点稳妥、征引资料翔实、考证论据充分，汲取了历代研究的成果。从量的方面看，它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性。对每个作家的生平经历都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对其作品有全面介绍，对代表作品有重点论述。做到了学术性和知识性相结合。

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上百个。它荟萃了几代人的研究成果，既有年逾古稀的老一辈专家，也不乏后起之秀的青年学子，更多的则是壮志勃发的中年。为发扬我国文学家的优良传统，为研究中国文学所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以供今天的文学作家来借鉴，几代人同心协力，辛勤笔耕，评述了中国文学史上灿若繁星的作家群。

从这部评传中，可以看到评价作家作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防止对古人过分苛求或过

分溢美的两种倾向。因此,多做些具体分析,比抽象的肯定或否定更有借鉴意义。

作品是社会的镜子,作家是时代的声音。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反映它的经济基础的。作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他所处时代、社会和阶级的制约。他们无论采取哪种文学样式去抒情、叙事,或写景、状物;也无论热情讴歌,或冷静观察、愤怒控诉,总摆脱不了时代、社会和所代表阶级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我们不必去责备作家的这种局限,也不应该否定这种局限。时代、社会的局限是任何人也超越不了的。即或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作家,也不能具体预见并反映出其后几百年的社会状况。对于阶级的局限,既不能仅仅根据作家的阶级出身去判断作品的阶级属性;也不能因为作品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某些真实方面,便从根本上断定这些作家站在劳动人民立场,过分夸大他们思想的进步性。

作家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思想和社会生活也是复杂的。更何况作品的客观思想大于作家的主观思想也是常见的现象。我们应该根据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去评价作家作品,对于古代作家,我们不必过分苛求他们没有反映出这些或那些社会的本质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在作品中已经反映出这些或那些社会的本质或侧影来。正是由于他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形象的画卷,才给后人以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这一真善美的艺术作用是任何其它社会科学著作所不能代替的。从中国文学璀璨夺目的画卷里,可以看到古代作家为坚持真理,也历尽艰辛。屈原被放逐,千

古尽掬同怀之情；魏晋文人纵酒谈玄，正是为了远祸全身；陶渊明归田园自有其难言之隐；多少返朴归真的诗人也都各有其隐私苦衷。至于那些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终不免被冷落，被罢黜，以至于被杀身的作家，又都各有其缘由，有些令人尊敬，有些值得同情，有些可以理解，有些则咎由自取。总之，都可以给后人以认识或教育的作用。

从这部评传中，还可以看到在一些进步作家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代代相传，日新月异，在各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屈原那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文天祥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千百年来，鼓舞了多少英雄豪杰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毅然舍身成仁，为国捐躯；李白那蔑视权贵的傲骨，启迪了无数知识分子出淤泥而不染；司马迁忍辱负重的品格，教育了无数身处逆境的人奋发图强。他们都从人民中汲取了智慧和营养，成为中国的脊梁。他们的精神和作品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无可讳言，本书还存在一些弱点和缺点，如各篇字数、质量都有不平衡现象。约稿范围不够广泛，也未能极尽国内名家，实为憾事。同样遗憾的是港台等地以及其他海外专家未能参加撰稿，以便为发扬我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建设祖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同尽炎黄子孙涓埃之情。但愿会期不远，弥补有日。

本书还存在许多亟待纠正的问题，发现它们的任务，留待给广大读者吧。他们，只有他们，才是最公允、最严格，也是最高权威的评论家。

编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

主 编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顾 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元化	王季思	朱东润	肖涤非
吴富恒	余冠英	林 庚	周振甫
	季镇淮	钱仲联	

目 录

庄 周	冯钟芸(1)
屈 原	姜亮夫(27)
宋 玉	陆永品(55)
贾 谊	董治安(65)
枚 乘	费振刚(79)
司马相如	费振刚(87)
司马迁	季镇淮(99)
扬 雄	李庆甲(141)
王 充	蒋祖怡 滕福海(161)
班 固	费振刚(177)
张 衡	龚克昌(187)
曹 操	徐公持(205)
王 粲	沈玉成(221)
蔡 琰	陈祖美(237)
曹 丕	徐公持(243)

曹 植	徐公持(259)
阮 籍	罗竹风(285)
嵇 康	郭维森(303)
潘 岳	韦凤娟(321)
左 思	刘文忠(341)
陆 机	蒋祖怡 韩泉欣(357)
郭 璞	曹道衡(379)
陶渊明	廖仲安(393)
谢灵运	沈玉成(429)
刘义庆	周一良(451)
鲍 照	曹道衡(459)
沈 约	王达津(483)
江 淹	曹道衡(503)
谢 朓	林东海(527)
刘 勰	牟世金(547)
钟 嵘	牟世金 萧华荣(585)
郦道元	段熙仲(601)
何 逊	张忠纲(615)
萧 统	殷孟伦(623)
庾 信	刘文忠(633)

庄 周

(约公元前 362——前 286 年)

冯钟芸

庄周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文学家。庄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学派之一，代表庄周思想的《庄子》一书，对后世的哲学、文学影响巨大。因其与老聃的政治、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一般合称为老庄。实际上，老子与庄周并不完全一致。

一、庄周的生卒和《庄子》一书

关于庄周的生活活动，现存的材料不多，根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和战国时期某些著作的零星记载，以及《庄子》中散见的片断，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

庄周，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①，与孟轲（约公元前 372——前 289）同时而稍晚，才极高，学极博，然而他一生中门徒不多，朋友有

^① 据马叙伦、吕振羽、范文澜、闻一多等论证，庄周生年为公元前 369, 335, 308, 375 年，卒年为公元前 286, 275, 286, 295 年。

限。当时学术界的名人中只有惠施同他经常来往，进行辩论。惠施死后，庄子叹息说：“自夫子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言之矣。”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只有荀卿提到过他，说他的思想认识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庄周在蒙做过漆园吏，大概时间不长，就隐退从事著述和讲学。他生活贫困，曾身居陋巷，靠打草鞋生活，《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曾“衣大布而补之，正纆系履而过魏王”。《庄子·秋水》和《列御寇》篇说到，楚王使人聘庄周，庄周不应。《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入以大庙。当是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记》把楚王写作楚威王，不知何据。很可能这段文字是从《秋水》、《列御寇》中两个相似的故事演化来的。《秋水》篇中还有一段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

庄周以鹓鶵（凤凰）的高洁自况，嘲讽了惠施。在他看来，梁国之相位犹如一只发臭的死鼠，而死抱住相位不放的惠施就如同一只可卑的鸱枭。

就《庄子》书看来，上述的思想可信。庄周极端蔑视功名利禄，不求闻达，要求“适己任性”以自快，不愿受世俗的种种束缚。他在《刻意》篇中说“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

从《庄子》所表露的思想看，他之所以甘受贫困，隐居遗世，主要因为他不满当时封建等级宗法制的社会现实，厌恶虚伪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说教，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反对人为。这种思想的产生，在当时拥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春秋战国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中，阶级关系有了变化，产生了封建地主阶级、农奴阶级。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自耕农。自耕农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它们有的是因立了军功，从奴隶、农奴上升为自耕农的，有的是逃亡的奴隶、农奴，在荒僻地区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的，还有的是从奴隶主、封建领主阶级下降为自耕农的。前面两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后一种情况有略加分析说明的必要。我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保留着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制度。它是按照血统关系确定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般情况，只有长子有财产和贵族地位的继承权，余子（即长子以外的儿子）所分的财产有限，余子的余子所得更少。先世是贵族，几代之后，除了长子、长子的长子……以外，其余的逐渐失去了其贵族的身份和特权，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春秋战国时期，有相当一批贵族的余子及其后代，地位下降成为独立的自耕农。他们有贵族的血统和文化教养，但只有小块土地，必须亲身参加劳动才可以维持生活，其政治经济地位与农民小生产者无异。这些人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对现实社会绝望，对现行制度不满，其中不少人厌世、弃

世成为隐者。《论语》中的长沮、桀溺、荷蓑丈人、楚狂接舆,《庄子》中的庚桑楚、南荣越等隐者,都属于这一类。庚桑楚等虽未必实有,但抱有这种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的人,则是确实存在的。他们一方面对传统和现实极端不满,愤世疾俗,甚至认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只给人们带来了不幸;另一方面,受小生产者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局限,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看不到前途,因之,思想趋于消沉,无所作为,产生“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尔而已”的虚无主义思想和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们因自己政治经济地位软弱,来自社会压力太重,强调适己任性,放荡不羁,借以求得暂时的精神解放或安慰。庄周正是这一类人的思想代表。庄周是宋人,那里长期受荆楚文化的影响。楚生产水平较高,文化丰富多采。据近年考古发掘的材料,其文化传统、思想风格以及俗尚,是独立于当时中原文化之外的文化体系。当时楚已是大国,具有高度发展的绘画、雕刻艺术,有精湛的纺织技术和医学科学技术。生活时代与庄周相近的屈原(约前340—277)在《天问》中提出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科学的问题,如: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能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庄子·天运》篇也表现了对宇宙运行、变化的关心和理解。《庄子·天下》篇还载有南方倚人黄缭曾探讨“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显然这绝非偶合,它反映了楚文化发展的高度、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探讨和认识。庄周的政治思想、人生哲学与屈原迥然不同,但其《庄子》中的文章的风格与思想的表达形式,可以找到与屈原相近的地方。

庄周哲学中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也有异常精辟的见解。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汪洋恣肆、恢诡谲奇的文笔，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文学家和哲学家。

长期以来，庄周的思想受到曲解和不公正的责难。魏晋之际，玄学兴起，玄学家纷纷注《庄子》。其中以郭象的《庄子注》影响最大，歪曲最甚。庄学全然有别于儒学，郭象《庄子注》实际上是调和了儒学与庄学，受其影响者，往往认为庄周和孔孟思想一致，甚至认为庄周乃是儒家后学（见韩愈《送王埴秀才序》）。魏晋以后，佛教盛行，高僧居士又以佛解庄，把庄周描绘成释迦的同调（见《世说新语·文学》）。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立，庄周与老聃被尊为道教的祖师，称《庄子》为《南华真经》，成了神仙家的著述。宋明时代《庄子》被视为异端受到理学家的攻击。

《庄子》是研究庄周思想的资料，是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汉刘向、刘歆定为五十二篇。传世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对于《庄子》各篇的真伪，后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周的著作，外篇、杂篇为庄周的门徒或后学所作。其根据是：认为内篇七篇思想一贯，风格一致，有代表性，因此定为庄周的著作，王夫之可以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见王夫之《庄子解》卷八）；也有人认为内篇文章好，除了庄周别人做不出，这可以焦竑为代表（见《焦氏笔乘》）；第三种意见说，魏晋以来学者都主张内篇是庄周著作，这是传统的看法。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

在确定哪些篇章是庄周著作时，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应引起充分重视：

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司马迁不仅指出庄周“明老子之术”、“诋訾孔子之徒”这一基本思想倾向，而且明白点出他所读到《庄子》中的若干篇篇名。司马迁有忠于史实的品质，有卓越的史识，他的记载应受到重视。就《庄子》一书来看，凡是“剽剥儒墨”、“明老子之术”的文字，多数集中于外、杂篇。老聃思想有激烈与消沉的两个方面，这两种倾向在《庄子》外、杂篇中也有反映。可以说，外、杂篇反映的基本思想是庄周的思想。庄周思想与老聃思想有渊源关系，其基本思想倾向源于老聃，这是公认的意见。如此，就应把最接近老聃思想的外篇、杂篇看作庄学早期的作品，即庄周的著作。而应把以消极思想为主要倾向的内篇列为后期庄学的作品。因为它只是庄周两种思想倾向中的一种，并且是不重要的一种。《史记》关于《庄子》的记载并无内、外、杂篇之分，传世的《庄子》是魏晋时代郭象编定的。在古代，整理者往往根据己意对文章进行删削编排。先秦的《庄子》是多少篇已经不详，汉刘向、刘歆定为五十二篇，郭象定为三十三篇，李颐定为三十篇，崔譔定为二十七篇，向秀定为二十六篇。文章的段落也经常被编纂者移动^①。

除非将来考古发掘到《庄子》的原本，我们不应当怀疑司马迁所见到的《庄子》版本，而轻信郭象编定的《庄子》本。

^① 如《齐物论》中“道未始有封”这段文字，在班固所编的《庄子》中在外篇，《养生主》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在隋朝和尚吉藏所见的《庄子》中也在外篇中，但郭象本《庄子》中，它们都编入内篇之中。